

如何做一个学者，他为后辈树立了榜样

追记美学家刘纲纪



“在目前的中国美学界，无论从美学理论上，还是从对美学史的了解和掌握上，他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一直埋头工作，不计名利，对科学有献身精神。”

德国著名汉学家卜松山教授将刘纲纪先生视作“中国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学者”之一。而卜教授所说的另一位学者是李泽厚——刘纲纪先生的北大同学、合作者，两人并称“北李南刘”。李泽厚曾在《浮生论学》一书中写下：“做美学研究的当代我们这辈人中，我认为刘纲纪是最不错的。”“虽然他最近还很厉害地批判我，但他有哲学深度。”



▲刘纲纪先生生前照片。武汉大学供图

本报记者李伟

刘纲纪先生的最早一批博士生、追随先生近30年的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邹元江教授，曾经写过多篇关于自己导师著作的书评文章，对刘纲纪的学术思想、为人生平非常熟悉。

但在为导师撰写悼词生平时，邹元江写到凌晨三点。万籁俱静时，想到珞珈山那盏苦熬一生的明灯终于熄灭，再也不能师生当面长谈，邹元江潸然泪下。

2019年12月1日，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7岁。

刘纲纪先生主要从事美学原理、艺术哲学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同时在美术理论、中国书画史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想等方面也作了许多开拓性研究，并有重要建树。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中，他是一位学界公认的学术大家。

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学贯古今、享誉海内外，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遍访刘先生的同事、学生和亲人，探寻大师耀眼的一生。

中国美学界数一数二的人

他和李泽厚合作撰写的《中国美学史》，填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忆当年合作 音容宛在；虽今朝分手 友谊长存。”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得知自己的同学、合作者刘纲纪去世，他悲痛地写下这句唁电。

短短两句话，浓缩了中国美学界“北李南刘”两位大师一生的相知情怀，更是当代中国美学走向繁荣的写照。由两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美学史》第一、二卷，填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读过《中国美学史》的人们可以发现，刘纲纪撰写的著作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美学思想为指导，论述了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并处处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美学的发展作了具有内在必然性的深刻分析，许多论述极富创见。

此后，刘纲纪先生进一步提出中国艺术文化的“六大境界说”，即儒、道、楚骚、玄学、禅宗及明中叶后具有近代人文主义、个性解放色彩的自然人性论，并一一作了深入分析。

“在文化逐渐成为软实力、凝聚力与竞争力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学事业，使之在国际上更多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刘教授在这一方面几十年来做了艰苦探

索和努力，取得重要成绩，是我国美学界少有的具有相当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的重要美学家。”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美学家曾繁仁教授7年前曾对刘纲纪撰写的《周易美学》一书表示赞赏，认为这是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这本《周易美学》著作的写作出版，是刘纲纪用时4个月，通宵达旦完成，1994年正读研究生的邹元江见证了这部著作的写作历程。那个月的时间里，刘纲纪是珞珈山最晚熄灭灯的那个人，成为了当时武大勤学的标志。

该书出版后，约稿编辑获得编辑界大奖，邹元江写了4篇书评，全部发表在顶级期刊……一本书，成就了许多人。

诸多开拓性的研究，令刘纲纪早早就成为一座大山，一座研究中国美学、艺术、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不可绕过的高峰。

作为北京大学同学和长期的合作者，李泽厚对刘纲纪有着比一般人更深的认识。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李泽厚就公开说：“我觉得他的水平很高，思想深刻。在目前的中国美学界，无论从美学理论上还是从对美学史的了解和掌握上，他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一直埋头工作，不计名利，对科学有献身精神。”直到2002年，李泽厚先生在《浮生论学》一书中仍坚持这一看法，说：“做美学研究的当代我们这辈人中，我认为刘纲纪是最不错的。”“虽然他最近还很厉害地批判我，但他有哲学深度。”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范与刘纲纪交往较多，上世纪80年代时，刘纲纪与李泽厚合著《中国美学史》时，为了写作联系方便，刘纲纪曾借住在北师大宿舍。

李范经常去看望刘纲纪，见证了刘纲纪日以继夜、呕心沥血地写作，常常是书桌上满是烟蒂。

德国著名汉学家卜松山在欣赏刘纲纪先生的艺术作品集时，这名德国人会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语：诗书画如其人。“欣赏刘先生的画作，他的容貌、人格仿佛就浮现在眼前。”美国著名华人学者傅伟勋教授在一些文章中谈到刘纲纪先生给他的印象时说：“刘纲纪具有哲学家的风骨，且为人诚挚可亲，实不多见，治学之勤，功力之深，令人叹赏。”

哲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情怀

“做古代学问，但不能忘了是一名现代人。”刘纲纪常常强调，做学问不能同现实隔离，要有现实关怀

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已经是武大哲学学院二级教授的邹元江讲述了导师的一生。在他看来，刘纲纪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一盏照耀后人的明灯，影响

了自己的整个人生。面对刘先生的期许，自己常常因为愧疚，不敢自称是大师的弟子。

“先生有幼功，在大师荟萃的北大熏陶之下，迅速成长。”刘纲纪先生1933年1月17日出生于贵州省普定县号营村，195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原来，从小家境不错的刘纲纪自幼爱好文艺，13岁时曾拜名师学习中国书画，幼功的积累，为他今后研究艺术美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北大4年，刘纲纪除了努力系统地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外，还师从中国美学界前辈学者邓以蛰、宗白华、马采三位著名教授学习美学与中国书画史论，与大师们成为忘年之交。

作为年纪轻轻小伙子，刘纲纪曾经多次指出几位大师家藏古画的假借之处。后生可畏，令大师们既气愤，又喜爱。

196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纲纪的第一部专著《“六法”初步研究》，这一年他年仅27岁。这部论述中国绘画理论纲领——“六法”的专著，曾得到邓以蛰、宗白华、朱光潜等著名学者的热情赞许。这是刘先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六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影响极大，是刘纲纪在美学研究上取得的第一个成果，也预示了他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当时，刘纲纪在北大的名气很大。担任北大学生诗社的社长，吹笛子、拉二胡、美声唱歌，刘纲纪是天生的从事美学研究的人才。作为一名较早发表文章的北大才子，他用稿费买西装，偶尔还会请同学们下馆子。才华横溢的刘纲纪，征服了当时北大俄语系的校花孙家兰，后来两人牵手相伴一生。

刘纲纪是一个有生活情调的人，喝德国黑啤、品咖啡，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极具现代感，非常关注社会现实。“做古代学问，但不能忘了是一名现代人。”刘纲纪常常强调，做学问不能同现实隔离，要有现实关怀。

“必须具备哲学家的头脑，艺术家的情怀。”这是刘纲纪常常对学生提到的要求，两方面缺一不可，也是一直走在国内美学研究最前沿的武大哲学学院招新教师的标准，延续至今。

刘纲纪与武大的渊源离不开一个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彼时，重才、惜才、爱才，还不拘一格地用才、育才的李达，亲自到刘纲纪在北大的学生宿舍，邀请刘纲纪到武大来，并愿意担任他的硕士生导师，1956年本科毕业之后，刘纲纪从此与珞珈山结缘。

李达非常理解、尊重并支持刘纲纪的兴趣与选择，在他离开北京仅一个月后，又将刘纲纪送回北大进修美学和艺术，并专门给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教授和著名美学家蔡仪先生写了介绍信。两年多后，刘纲纪返回武大任教，至此60个春秋，珞珈山的夜晚总有一盏明灯在亮。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李耀南1997年考入刘纲纪门下读博士，当时只读过刘纲纪的书，仰慕大名，从未见过面，在参加了博士入学考试之后，李耀南忐忑地敲开了刘纲纪的办公

室大门。

初次见面，两人长谈了两个小时。李耀南回忆称，当时已经60多岁的刘纲纪思维敏捷，言谈之间饱含激情，一种渗透理性光芒的激情，时刻不能懈怠的学风，至今感召着自己。

博学乐观，成风化人

刘纲纪晚年有一个遗愿，为进一步摆脱当年思考的时代局限性，他要重写中国美学史，在病床上仍然坚持

文革期间，刘纲纪被下放至襄阳一个农场负责放鸭，正是在池塘边，刘纲纪没有忘记读书，他读了朱光潜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译作等。

清苦的生活，很快迎来了思想著作的井喷，回到武汉之后，他在夫人所在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的一间狭小的宿舍里，一张小凳旁，流着汗，陆续写下了多篇艺术哲学著作。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者，为我们后辈树立了如何做一个学者的榜样。”我国著名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当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在武汉大学任教，同刘纲纪在哲学系共事达30余年，对刘先生的学问和为人品多有了解和浸润。“刘先生有坚定的学术信念和人格操守，直到耄耋之年，仍然殚思竭虑，笔耕不辍，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我国的美学研究事业。”

“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易中天38年前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刘纲纪是答辩评委之一，两人因为学术观点不同，在会上发生争论，易中天也大胆地回应“我还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尽管两人当场争执得面红耳赤，但是刘纲纪仍然对易中天的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打了优秀。

正在国外、来不及赶回国内参加追悼会的易中天感慨：“这样的师德师风，让我终生难忘。”他遥寄挽联一副以表哀悼：大美无言，治学本当知纲纪；中庸有道，为师原不计逆从。

李耀南告诉记者，刘先生对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大胆独立思考，绝不允许学生盲从。作为一名导师，他更注重因材施教，不仅指出学生学问短板，更关注学生的性格不足之处。

李耀南回忆，自己从农村出来，刚开始性格上有些胆小怕事，刘先生看出问题后，经常教育他，胆子要大一些，不要怕。“这个问题你已经想清楚了，如果你没表达好，那就是你没本事！”博士论文答辩时，看到李耀南又有些胆怯，这一次刘纲纪有些急，这一番少见的发火，也激了一把李耀南。

最后，论文答辩现场上，李耀南放开表达，侃侃而谈。顺利通过答辩，刘纲纪非常高兴，拉着李耀南合影留念，这一难忘瞬间，李耀南至今珍藏在家。

如今在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与设计学院任教的张完硕教授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作为一名韩国留学生，当年先生每周给他一个人上一门课。台上70多岁的先生侃侃而言，台下张完硕似懂非懂。回去后，还要反复聆听录音，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请教一番，老师就又一讲一遍。

“先生不用电脑，从左手写，手指上磨了厚厚的茧。”如今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的王海龙博士，曾跟过刘纲纪先生5年时间，他见证了80多岁的老人，熬夜帮博士生修改论文的过程。“先生对学问和学生都极负责，从来亲力亲为。写书，从查资料到最后，都要自己完成。”

刘先生的2008级博士李红霞含泪追忆：说来惭愧，我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先生熬了一个整夜修改的。那天从先生手里拿出他修改过的论文，看到了先生憔悴的面容，还有熬夜后的眼睛，心中满是愧疚。那时递交给先生的博士论文，我还没来得及写前言，先生高屋建瓴地把我论文将来要做的，而我未能看到的方面指了出来。

王海龙有些痛心地说：“这几年先生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但是他从不拒绝学生的活动，非常支持年轻人。”曾担任武大研究生会主席的吴汉勋透露，武大书画协会主办的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已经举办30多年，刘纲纪先生一直坚持亲临现场开笔、点评，身正为范，启蒙激励着一代代珞珈山的年轻人追求美好。

“未来只能怀念先生的音容笑貌，细读著作，追忆精神，继承遗志。”武大哲学学院院长吴根友说，每次拜访先生，都是在谈学问，先生特别自然地表达对中华深厚文化传统的自信，也有着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吴根友透露先生晚年遗愿：为进一步摆脱当年思考的时代局限性，他要重写中国美学史，在病床上仍然坚持。“作为后人，我们希望先生的遗稿很快能整理出版，让世人更好地了解他的一些问题更深入思考的成果。”

(上接13版)

“这辈子够了”

在今年的牦牛博物馆馆庆活动上，亚格博在致辞中以藏汉双语告诉人们，这可能将是他最后一次以馆长的身份参加这个一年一度的庆典。

他已经65岁，觉得该给牦牛博物馆找位新馆长了。

“听到这消息，我既心酸，又欣慰。”北京大学教授、原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说，“心酸的是，博物馆中的牦牛们将告别这位精心照料它们的老阿爸；欣慰的是，这位年近古稀、搭上老命去工作的老援藏干部终于可以歇口气了。”

20世纪80年代，亚格博差点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后来他回北京工作的20年，几乎放弃了写作。

西藏是他创作的氧气，二度进藏，他建博物馆边拾起笔，连续写出《藏北十二年》《最牦牛》《形色藏人》三部非虚构作品。

年轻时钟情于诗歌和小说，如今，亚格博发现“真实比虚构更离奇。”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要了解今天的西藏，“最重要的是生活在当代西藏的人，是他们的身世和经历、故事和命运。”

吴志攀用化名《藏北十二年》绘制了上百幅插画，他的女儿则是书中故事的英文译者，亚格博的养女桑旦拉卓是这本书的藏文译者。

亚格博不擅长谈论自己，即使我们为他的故事而来，他热情讲述的也大都是朋友们的故事。

有时候，他会思考一个人的价值到底何在，他觉得肯定不在于能挣多少钱、有多大名。回首自己一路走来，他无得意：“我这个人啥也不会，做了牦牛博物馆，这辈子够了。”

“老牦牛”

“无言的战友”

2019年7月1日，一场特殊展览在西藏牦牛博物馆开幕。这场名为《无言的战友》的特展，是牦牛博物馆给中国共产党建党98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川藏和青藏公路通车65周年、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的献礼。

“无言的战友”就是牦牛，这是亚格博的研究成果。

2018年夏天，年过花甲的亚格博，在成都的街巷深处几经辗转，终于在干休所找到了98岁的解放军十八军老同志魏克。这是与西藏结缘的两代内地干部的一场“牦牛会”，因为亚格博在研究牦牛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发现，当年亲历十八军进藏、和平解放西藏的魏克，曾用“无言的战友”形容牦牛对解放军进藏不可替代的帮助。

据魏克了解，在川藏、青藏公路通车前的近5年时间里，藏族人民出动牦牛达100多万头支援解放军运输。这些牦牛，不仅默默地驮给部队运来了物资，还是解放军在冰天雪地进军时的开路先锋！

亚格博更多的研究发现，令我们对“无言的战友”更加肃然起敬：

——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在中国革命最困难最危急的关头，藏族人民赶着牦牛支援红军。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曾对藏族老红军天宝说，“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牦牛革命’。”

——解放军十八军老同志王贵说过：“如果说淮海战役的



▲亚格博戴着用牦牛毛编织成的眼镜。牧区没有墨镜，牧民用这种眼镜防止雪盲。 本报记者觉果摄

胜利，是人民群众的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那么，西藏和平解放的胜利，是党的政策的胜利，也是藏族人民用牦牛驮出来的。”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当时没有公路，部队给养全部靠人背牛驮，藏族群众用牦牛支援前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藏族支前模范曲美巴珍赶着自家的牦牛，为了解放军驮运物资，至今仍被传颂。

——在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过程中，赶着牦牛支援人民解放军的藏族群众，也比皆是。

——在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边境交通极为不便。据当时的作战参谋、后任西藏林芝军分区副司令员李春同志回忆：“没有公路，印军想不通，中国军队靠什么供给给养？以为我们有什么高级食品，吃一顿能管好几天。其实，我们就是靠老乡支前，靠牦牛运输。”

——20世纪80年代，西藏阿里波林边防连战士收养了一头无人认领的黑牦牛，这头牦牛为战士驮水十多年，直至衰老。战士们为其养老送终、建墓塑像，向南疆军区申报并获得批准为其荣立三等功，这在军史上独一无二。

当年进军西藏时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之女张小康、政委谭冠三之子谭戎生、西藏区委书记阴法唐之女阴建白，参观《无言的战友》深受感动；没想到有这么精彩的展览，没想到博物馆把十八军记得这么深！

牦牛文化也是红色的！在拉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期间，很多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参观《无言的战友》特展。

在这里，他们能听到《初心 使命》的童声合唱：“我们不忘初心，五星红旗飘扬喜马拉雅；我们牢记使命，西藏大地开遍幸福之花。啊，岁月流淌，追梦者永向天涯。”这首歌，作词的是亚格博。

追梦者永向天涯！这是革命前辈的精神不朽。追梦者永向高原！这是共产党员吴雨初的初心流淌——他的心，永驻精神高地。